

清华哲学学堂名师讲坛

楼宇烈



楼宇烈先生，1934年生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、学术委员会委员；著有《王弼集校释》《荀子新注》《中国的品格》《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》《中国的人文信仰》等。

第一讲 哲学与中国哲学*

万俊人：各位同仁、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们清华大学哲学学堂班的名师讲坛正式开讲，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楼宇烈先生来作为这个讲坛的开讲人，给我们做这两次讲座。楼先生是我在北大的老师，是各位同学的师爷辈。学校高度重视学堂班的活动，请让我首先代表彭刚副校长——因为他有公务在身无法前来，原本是由他来主持这个开讲仪式的，他特别嘱咐让我代表他，同时也代表清华人文学院、我们哲学系，以及从北大过来清华的陈来学兄、吴国盛教授，向楼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、热诚的欢迎和衷心的祝愿。精英教育本来是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路径，而学堂班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我们首期哲学学堂班只招收了十二位学子，但我们这个讲坛是对哲学系、对整个人文学院、对整个清华大学甚至校外的学生开放的。

我们之所以请楼先生做开坛第一讲，是有多种考虑的。第一，楼先生在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化特别是儒释道这一主要脉络上是有着高深造诣的老前辈，是能够打通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各个不同侧面、不同派别、不同维度的前辈学者。所以由楼先生领我们进入中国文化、中国哲学的殿堂是再合适不过的。

第二，楼先生不仅精通古典中国学术，而且熟悉现代前沿科技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楼先生在电脑技术上是中国哲学界的顶尖高手。我在学习如何使用电脑的时候，楼先生已经有了个人网站，各位同学可以去登录。当然，我不知道楼先生这个网站是否还在运行。我记忆尤其深刻的是，有一次我写一篇长篇论文，是一篇约稿，写到一万七千字的时候，忽然病毒侵入，整个电脑黑了，一个字也找不着，电脑没法用了，所以我就唉声叹气。那个时候我是在北大哲学系，楼先生就问我：“你咋了？”我就把这个事

* 2021年10月21日，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413报告厅。

告诉了他。他说：“别着急，我骑自行车跟你去看看。”那时候我住在燕北园，楼先生骑着自行车，冒着夏日的酷暑去给我收拾这个被病毒攻击过的电脑，大概一个半小时就修好了。我对此记忆特别深刻，因为我在旁边充满疑虑，我心想：楼老师这么厉害？还能把这个东西救活、起死回生？我抱着怀疑主义的态度，但是又充满期待，等着楼老师。结果不到一个半小时，楼先生给我救活了一万五千七百多字。他说：“那最后一千多字，你写的时候没有存，没有存就救不活了。”那一刻，我除了感激，更多的是惊喜，以及对楼先生计算机技术的钦佩。所以楼先生熟悉现代科技，熟悉现代思想和前沿，他的学问是古今中西都贯通的。

最后一点呢，是师生情谊的缘故。我在北大学习工作期间，楼先生是我的前辈、老师，对我提携、教导，我一直念念不忘。能让人存在记忆里的老师、前辈并不是太多，楼先生是我时常念及的。他的学问、品格，他的为人之道，大家都佩服。楼老师在当今中国文化界甚至传播界都享有盛誉，请楼先生来做开坛第一讲再合适不过了。但楼先生年事已高，耄耋之年仍精勤不倦，我不想让他累着，希望让先生自由一点，能讲多久就讲多久，然后各位同学提出问题，楼先生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楼先生给我们开讲！

楼宇烈：

各位老师各位同学，大家下午好。很荣幸能够来给我们清华大学哲学学堂讲课。我不打算作报告，只是跟大家漫谈。刚才万俊人先生讲到的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过去的事我现在很多已经记不住了，刚刚讲的我也记不住，所以今天我要做的，其实已不能算一个正式的报告，我只能够随便地谈一谈我的一些想法，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，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。刚才讲到我的电脑，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。现在在这方面，我已经落后于很多很多人了。技术的进步是很快的，让每个人都追赶不上。

我听说，后面还有陈来老师等的讲座，大家要多听听。今天我想讲的，

是我对哲学的一个认识，这个问题要讲清楚，是很麻烦的。近代这百年以来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整个学术界在对哲学的认识上还有很多议论，特别是“中国文化中有没有哲学”这个问题，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为止，还一直在讨论。这是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理性、合法性。

所以要讲中国哲学，就必须要先从哲学本身说起。哲学究竟是干什么的？其实在传统文化中——中国的也好、西方的也好——并没有把学科分得很细的这种分科的学问。我不知道在座知不知道 science（科学）这个概念，它最初包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我认为不清楚。现在我们如果去查一查《辞书》《辞海》这些辞典，就可以看到，这个词最初是指分科的学问。所谓科学，就是分科的学问。一分科，就要给每个科目定个目标、定个方向、定个范围、定个方法。所以哲学在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，就要给哲学本身下个定义：哲学是什么？哲学是研究什么的？解决什么问题的？它的对象是什么？都要界定。

所以当哲学这个词出现以后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：中国有没有哲学？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。近百年来，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，由于西方文化的进步，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很多东西都忽然变成了问题。首先，有没有科学？然后，有没有哲学？有没有宗教？有没有艺术？甚至，有没有信仰？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没信仰。其实科学也好，哲学也好，宗教也好，都是一种信仰。我曾经说，人们不可能活着而没有信仰，只不过信仰不同。我信仰这个，你信仰那个，我着重这方面的信仰，你着重那方面的信仰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是一种信仰，人不可能没有信仰而活着，信仰一定是有的。各种信仰的不同特点，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，你信仰的这项是什么？你信仰的方法是什么？这些有很大的差异性。

最近我出了一本书，这本书也不是我现在写的，是我的学生帮我整理了过去的一些讲演、文章，然后出版的。这个书名也斟酌了半天，最后他们定的就是《中国的人文信仰》，中国人信仰的特征就是人文信仰。近年

来，由于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都把西方文化的特征作为一个学科的标准，所以就会出现刚才我提到的“这没有，那也没有”的情况。当然另外还有一种极端，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从中国传出去、发展起来的，是由一种现代科学思维的方式所造成的——什么东西都要找一个源头。我们现在不是也在溯源、找源头吗？人类是从哪来的？人最开始在地球上从哪出现的？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。当然，还有再去追究整个地球生命从哪来的：从上帝来的，从外星来的，从地心来的，不一而足。

可见这样来做研究，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惑。谁也证明不了，谁也否定不了，所以就会给自己造成很多很多的困惑。讲到哲学这个概念——我再回过头来讲哲学这个概念——大家可能都知道，近代一批一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以后，看到日本人把 philosophy 翻译成哲学，也就把哲学这个概念引到中国了，所以这个哲学里面都经历着一些什么东西，比如说 philosophy 究竟是什么，争议很多。其实西方哲学，西方 philosophy 传入中国，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，最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有了。16 世纪西方宗教改革的时候出现了新教，以至于传统的罗马教廷天主教的很多传教士、神父在欧洲失去了传教的领域，他们就跑到东方来。一大批传教士，特别是耶稣会的传教士跑到东方来，跑到中国来，跑到日本、朝鲜半岛来，寻找传教的领地。这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，就已经把 philosophy 这种学问传到了中国，当时中国已经知道，在西方有 philosophy 这样一门学问。其实传教士传的 philosophy 主要是跟神学相关联的，因为神学也是用亚里士多德的那一套东西来讲的，当时就传进来了。传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学者叫李之藻。李之藻帮助传教士来整理神学这一套系统的时候，翻译了一本书，书的名字叫作《名理探》，人名的名，道理的道理，探究的探。在《名理探》这本书里面，李之藻讲到了这个词，原来西方有一个学问叫作 philosophy，他用音译，用中国的语言汉字把这个单词表达出来，叫菲洛索菲亚。

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引进境外学问的一种方法。翻译外来的东西，有

两种办法，一种办法就是音译。现在音译的词，尤其是佛教音译的词在中国文化中很流行很通畅，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大家日用而不知的程度。当时他们就采用了“菲洛索菲亚”来翻译，除了音译，他也解释了这个词义，他说这个词是从古希腊而来的，菲洛就是爱，索菲亚就是智慧，所以 philosophy 就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。同时他们也表明了这种学问实际上跟我们的道学或者理学差不多。我们现在叫宋明理学，用理学这个概念多一些，但宋明理学还有别的名字，叫宋明道学，这跟哲学也是一个意思。所以中国人早就接触到了这一门学问，只是近代以后译作哲学。

哲学这个概念，是近代我们一批留日的学生把它从日语转译过来的。日本的翻译是那样，我们现在到日本去，发现他们把电视翻译成了テレビ，就是 television 的音译。我们根据日语把 philosophy 翻译成哲学，但哲学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是找不到的。之所以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争论，就是因为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只有“哲人”这个词，而没有“哲学”这个词。日本人把“哲人”这一概念学过去了以后，他们知道哲人的“哲”字是什么含义，“哲”就是聪明智慧，“哲人”就是有聪明智慧的人，所以他们对哲学的翻译其实也没有错。但还是有一些差异，比如说爱智慧和有聪明智慧不一样吧，日本那边感觉这两个概念一样，但其实这两个概念不太相同。哲就代表聪明智慧，但哲人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指具有聪明智慧的人，不是简单的一个爱智慧，而直接就是具备了智慧的人。但是日本人把它用到翻译 philosophy 上去，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很多困惑、很多争论。这一争论呢，有意义也没意义。有意义的是，我们能搞清楚有一个方向；没意义的是，纠缠在这个名词概念的讨论上，反而失去了根本上对人生意义的追寻。

讲这些啰里啰唆的东西，我们要明白，哲学这个概念确实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新名词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国文化里找到它的根源。虽然这些根源有些差异，但是也可以沟通。我们总是用西方的标准来思考哲学，但是西方的标准也是不统一的，各有各的说法，所以研究哲学，究竟是研

究什么？我们现在通常讲的“三观”，也可以说具有哲学依据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也是我们哲学需要研究的。但对我们中国哲学而言，最根本的不光是纯粹学术性的问题，而是对“三观”的运用、落实问题。哲学研究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，是存在第一性还是思维第一性？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思维第一性？所以才有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别，这个对哲学界的影响很大。我很长一段时间把哲学看作就是研究存在和思维的关系，因此就要解决思维第一性还是存在第一性的问题。认为存在第一性，存在决定思维，就是唯物主义的；认为思维决定存在，就是唯心主义的。唯心主义还分为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等等。我读哲学系的时候，这个观念很深很深，把整个哲学对象看作唯物唯心，看作存在和思维，特别是1949年以后，受到苏联当时哲学观念的影响，把哲学史定义为一部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。我们过去写的哲学史，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，都是沿着这一线索来写的：首先分清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，然后要不断证明，历史就是一个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过程。

我不知道这种观念在今天会怎么样，我已经脱离哲学史教学二十多年了，甚至更长时间。陈来他们今天讲哲学史，是不是还那么讲？我想肯定不会了，肯定不会照着这个套路来，把哲学史讲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，讲成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。但在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样，所以就把哲学看得特别局限。我们说哲学是为了探究世界观或者宇宙观，没错。但科学难道不探究？科学也探究呀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三个概念：时空、世界和宇宙。第一个，时空概念，我们的自然科学就是探究时空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时空的概念、世界的概念、宇宙的概念，这三个概念完全是一样的，它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就叫时空。世界这一概念跟佛教有关系，世是时间，界是空间。宇宙是中国传统概念，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。所以不管探讨时空观念也好，探讨世界概念也好，探讨宇宙概念也好，其实探讨的是同一个问题。中国表达时空的概念就用宇宙，当然也用“时”这个概念，而且特别强调“时”这个概念。在

中国文化里讲这个“时”，往往是和“空”联系在一起的。时是离不开空的，空也离不开时。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要突破，要发展，就必须冲破刚才我讲的这些框框。

我们现在讲东西，还要运用哲学这个概念，没办法、回避不了。哲学究竟要探究什么东西？哲学还有一个名字叫形而上学，其实这个又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转变过来的，亚里士多德曾经有部著作叫作《物理学之后》或者叫《物理学之上》，后来把这本书翻译成《形而上学》。物理学有其现象，但现象之上、之后是无形的，探究这一块东西的学问，我们将其翻译成形而上学。“形而上学”正好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对应了，中国的文化就讲究形而上、形而下，而且很明确，在《周易》里就有这样的话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中国文化分道和器，我们探究的世界，器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道。所以我也经常讲，中国的文化，包括中国的哲学，其实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求道的学问，就是一个求道、学道、悟道、证道的学问。不要以为求道就是道家，儒家也一样啊，孔子在《论语》里甚至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早晨能够领悟道，认识道，晚上死了也心安，没有白来一趟。作为人，最重要的是要“志于道”，立志去求道。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艺也就是气质层面的，是艺术的那个艺，当然也跟“道德仁义”的“义”相通。孟子经常讲“居仁由义”，这个义，不是艺术的艺；《论语》里面讲的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则是艺术的艺。这里面讲的是“道”“艺”关系问题，二者是完全打通的。我们求道是要通过艺，学艺是要上升到道，所以今天讨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，我认为中国没有一种纯粹理性的推论式的抽象学问，我们的传统，都是想把这些东西落实到生活中去，而不是只讨论那些抽象的推理性的东西。

那么中国文化史中，有没有类似西方的抽象推论？有。名家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逻辑推论、抽象推理的学派，他们有很多推理都很有道理，分析得很清楚。比如说名家有两个概念，是很通俗的命题，大家应该

都知道——“白马非马”和“离坚白”。对不对呢？从逻辑层面上讲，毫无问题。因为白马是有颜色的、有形状的，白是颜色，马是形状，马是光有形状没有颜色的，所以你不能把有颜色的跟只有一个形状的名词等同起来，所以白马非马，讲得振振有词。“离坚白”也一样，一块白色的石头，它的坚硬和它的白色是可以分离的，这叫作“离坚白”。我们可以单独讲白色，也可以单独讲石头的坚硬，这种在逻辑推理上面可以说找不出一点毛病来，很合理、很对。但这个能跟现实完全等同吗？不能。什么马都是马呀，白马也是马，黄马也是马，黑马也是马，从概念上讲两者是不等同的，但从现实上来讲又是等同的，又是可以包含的；白马非马，从逻辑推理上毫无问题，我们也敢讲。最近我跟我的学生们讲，开个玩笑，你敢讲白人非人吗？敢讲吗？白人非人这句话和白马非马这句话从逻辑上讲都一样的，都是毫无问题的，所以由单纯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很多东西，我们要审慎、要再思考，不能随便去盲目信从。对很多哲学命题也是一样。

对很多哲学的命题，我们要思考，不能因为它有道理就轻信。从逻辑上讲得过去，并不一定在事实上通得过去。中国哲学在这一点上有非常重要的特征，但人们不理解，到现在为止，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思维，为什么？因为觉得中国人不懂得逻辑推理。像我刚才讲的名家的结论，这些都是很鲜明地通过逻辑思维方式推理出来的，但中国人看得到这样做的弊病，不太主张用单纯的逻辑推理、所谓的理性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，而是跟感性直觉结合起来，认为这样才行。我们不是单纯地用理性逻辑思维的方法去思考问题，而必须跟感性的、直觉的思维方式进行结合。所以很多人以为，中国没有逻辑思维，就没有哲学。但中国人讲哲理——哲学的道理通过很多的故事、比喻讲出来。后面这一点，我觉得很对，中国人就希望通过故事、通过比喻让你领悟到一个最根本的道理。

这就又讲到佛教了，圣凯法师正好也在这。佛教里面就有大量的比喻、大量的故事，但就在这些比喻和故事里面，包含着很多深刻的道理。不管天道也好，人道也好，都有。所以如果了解了佛教的表达方式，我们就会

知道下面这句话的重要性：“佛家善譬，多有理趣。”许多佛言禅语都是打比方，但这里面包含着大量深刻的道理。其实何止于佛家，中国的道家也一样。我们如果看看道家的《庄子》这本书就会发现，书里面也都是通过故事、通过比喻来讲很多深刻的道理，通过这些故事、通过这些比喻，让每个人去领悟它、去体会它。它并不是告诉一个所谓的明确的逻辑道理，让你去死记，让你盲目地信从，而是让我们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去体会它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调动每个人的社会积极性，不是单纯地接受既成的结论，而是通过故事和比喻去把道理找出来。我们的哲学也不光要找出道理来，还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。

我们现在读书啊，往往成为就文字论文字，或者是专门去分析文字。这么做对不对呢？也对。需要不需要？也需要。但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跟中国人的思维有很大距离。我给大家推荐一句苏东坡论读书的话。当时他一个朋友刻了一本佛经《楞伽经》，这是佛经里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。当朋友把这部经刻出来传播的时候，苏东坡写了跋，也就是后记。在跋里面，他就告诉大家怎么读经典，其中有这么两句话：第一句话是“遗文以得义”，不要停留于文字之上，要把文字遗忘掉，“义”就是经典告诉你的那些道理。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读书的方法，但接着他又讲了一句话，这是有点惊人的——“忘义以了心”，刚得到义，又让你忘掉义。遗、忘，两个字对应着，“遗文以得义，忘义以了心”，忘了义，才能解决你心中的问题。所以不仅“遗文以得义”，还要“忘义以了心”，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。我们学哲学，也不要光停留在文字上面，我们要解决自己心中的问题。我还经常讲，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点，不仅要探究文字中的意义，还要让你去探究言外之意。这种求意和探意——求文中之意，探言外之意——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思维模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
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活动，“周易书院联盟”的活动，我讲了书院的特征。清华也成立了好多书院，我希望我们能真正传承书院的特征和精神。在中国文化中，书院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和精神呢？首先，书院的氛